



The Biblical Library
圣经图书馆

[美]杨克勤◎著

孔子与保罗

CONFUCIUS AND PAUL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MIHORE

圣经
图书馆

[美]杨克勤 ◎ 著

孔子与保罗

天道与圣言的相遇

CONFUCIUS AND PAUL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杨克勤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7058-0

I. 孔… II. 杨… III. ①孔丘(前 551 ~ 前 479)—人物
研究 ②保罗, S.—人物研究 IV. B222.25 B979.91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64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圣经图书馆

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

杨克勤 著

- | | |
|----------|--|
| 统 筹 | 储德天 |
| 责任编辑 |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
| 特约编辑 | 花威 |
|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
| 责任制作 | 肖梅兰 |
|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 电话总机 |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
| 客服电话 | 021-62865537 (兼传真) |
| 门市(邮购)电话 | 021-62869887 |
| 门市地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 网 址 | www.ecnupress.com.cn |
| 印 刷 者 |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 × 1240 1/32 |
| 插 页 | 1 |
| 印 张 | 14.75 |
| 字 数 | 322 千字 |
|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17-7058-0/G · 3959 |
| 定 价 | 48.00 元 |
| 出 版 人 | 朱杰人 |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第三》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后书》3:16

圣经图书馆

The Biblical Library

主编

Chief Editors

杨克勤 梁慧
K. K. Yeo, Hui Liang

学术顾问委员 (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n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of strokes in Chinese surnames)

贝尔 (美国海涵学会) David Baer (Overseas Council, USA)
朱厄特 (德国海德堡大学) Robert Jewett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Liu Xiaof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C)
克拉兹 (德国哥廷根大学) Reinhard Gregor Kratz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Germany)
克莱因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Jacob Klein (Bar-Ilan University, Israel)
麦格拉思 (英国牛津大学) Alister McGrath (Oxford University, UK)
帕特 (美国范德比特大学) Daniel Patte (Vanderbilt University, USA)
佩杜 (美国布莱特神学院) Leo G. Perdue (Brite Divinity School, USA)
罗宾斯 (美国爱默瑞大学) Vernon Robbins (Emory University, USA)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uo Xin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C)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Yang Huil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C)
赵敦华 (中国北京大学) Zhao Dunhua (Beijing University, PRC)
柯林斯 (美国耶鲁神学院) John J. Collins (Yale Divinity School, USA)
威瑟林顿 (美国阿斯伯里神学院) Ben Witherington III (Asbury Seminary, USA)
格斯滕伯格 (德国马堡大学) Erhard S. Gerstenberger (University of Marburg, Germany)
朗曼 (美国威斯蒙特学院) Tremper Longman (Westmont College, USA)
萨肯菲尔德 (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 K. D. Sakenfel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温特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Bruce Winter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奥登 (美国德鲁大学) Thomas C. Oden (Drew University, USA)

圣经图书馆

主编：杨克勤 梁慧

缘 起

自西学入华以来，中国文教体制分崩离析，中国学人一直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文明如何轻而易举割断我们的学统，终止了我们的道统。中西之争的题域一直困扰着我们。其实，中西文化各有其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宗教文化之渊源，而这些渊源无不以古雅圣贤经书为开端和基石，形成经典。所谓“经典”，系指一种影响悠久文明形态走向的文本源头，蕴涵先知圣贤的智慧，其历经时间的长久考验，仍然能作用于今天的世界共同体与文本进行生命交汇，具有孕育一种重植根基、重温知新、重现思想的能力。刘勰《文心雕龙》道：“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第三）“经典”的魅力在于它隐含宇宙秩序的永恒原则，背负磅礴的天理及诚意，其理想和认知超越了所起源的历史人文环境，构筑了现代社会、经济和文教体制的重要基础。因此，倡导以经典为基础和以文本为依据的主要目的：一，避免对古文化“道听途说”或“皮相论据”；二，以治经方法回归原典，重拾学统学理，从中取得借镜，在与圣贤的席谈中，寻索真知灼见，破解“中西之争”之伪；三，回归经典意味当下，我们要从“中西之争”的题域回归“古今之争”的视域，进而通达“古今之变”。

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基石之一是圣经。本丛书“圣经图书馆”以希伯来和基督宗教正典文本为经，以人心并大道的普世共通性为纬，勾勒整全西方文明的基础图景，诚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先生行状》）虽然这些经典的思想源流、历史演进和影响主要在西方，但希伯来

和基督教智慧发源于古代西亚，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的精神珍宝和学术宝库，故使徒保罗写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

本丛书“圣经图书馆”旨在引介、注疏、移译和诠释各部经书，积累西方经学史的重要文献，改变我国西学研究长期偏重哲学论著、忽略宗教经典注疏的偏颇，以期对西方文明有整全而深入的理解。且在此基础上，鼓励、催生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对话和汇通。对“经典”的述作，旨在传承、固守、辨析一种文明形态的思想光谱，垒砌一种文明发展的基石。

“圣经图书馆”以“文史哲”为进路，旨在消弭“文史哲”的分割，此乃是中西方共通的古典治学之道。其中，以“文”为基础，即对文本的字、句、文法的分析和理解，包括训诂和修辞（或辩说）两大部分。古拉比及古希罗学人注重解经学和修辞学，中国先人自有类似注疏治学传统，讲究从“小学”进至“大学”。“小学”以字词训诂、文言语法和音韵为主，通晓字义和句义后，进入“大学”，在天地宇宙的视域中体认求索修身治国之道。以儒家为例，传统中国的“大学”建立在对德的自觉体认之上，天道统摄人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明明德篇》）。而西方的“大学”则以哲学为主，亚里士多德以神学为第一哲学，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基本认同了这一看法，把“文史哲”的方法转换为以圣经文本为主，继而遍寻史料史实，再以系统神学或神哲学为至真。

“圣经图书馆”规划出版研经工具书、参考书和注经书，旁涉文化背景探讨、史料整理和思想梳理，同时鼓励圣经跨文化解读方面的翻译和原创著作，以此裨益汉语及全球学界。在“置身区域，迈向环球”的大趋势下，“圣经图书馆”的撰述编译工作由国内外学者承担，并邀请国际圣经学界资深学术顾问，发轫并共臻经典编撰这一学术事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Prospectus

To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studies to China contains both blessing and danger. The dilemma they confront is how to embrace the good and to reject that which threaten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China. The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mains the central *problématique* for many Chinese scholars today. The series editors believe that the philosophy, morality, and religious practice of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their own etiologies worthy of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East and West have given rise to civilizations, world views, and cultural excellence that owe their origin to foundational texts or Scriptures. These classical texts are deemed sacred; they contain the wisdom of prophets and sages,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continue to shape contemporary global societies. When these texts are read intertextually, respectfully and appreciatively, they will benefit the people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ne of the central texts and cornerston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the Holy Bible. Now it is a prized possession of the world, and not the monopoly of Europe or the West alone. Students of world scriptures toda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such texts historically and to develop fresh new hermeneutical insights for entering into dialogue with them. The Biblical Librar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sacred Scriptures of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its universal readers on the other. The biblical text contends that “all scripture is inspired by Go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and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2 Timothy 3:16)

The Biblical Library seeks to promote the wholistic approach to Scripture through methodological and exegetical studie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and finally through philosophical and conceptual inquiry. Being grounded on the Chinese horizon but committed to benefit glo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objective of the Series is consistent with classical Confucianist, Daoist, rabbinic, and Greco-Roman studies. Thus, the Series aims to publish biblical introductions, commentaries, translations, and hermeneutical studies of the Bibl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Series encourages the intertextual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 of the Bible with the varied cultures of China. The Series hopes to benefit Chinese readers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scholarship of Western readers. We value indigenous theolog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 diversity of the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as well as writers, editors, and translators, will illu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沈 序

过去我总认为,若要將儒家与基督教做比较研究,最好是拿孔子与耶稣比,拿孟子与使徒保罗比。这或许是受到林语堂先生影响的缘故吧!犹记得林语堂在英译《庄子》的序言中尝谓,“耶稣之后有保罗,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孔子之后有孟子,老子之后有庄周。此八贤中,前生者皆先知先觉,或未尝著书,或所著甚少,后继者乃加以发挥阐扬,成就鸿篇。”我一直以为林语堂此话甚有道理,直到我读到杨克勤教授的《孔子与保罗》一书手稿之时,简直吓了一跳,心中纳闷,为什么不比较儒家的立教者孔子和基督宗教的立教者耶稣呢?

然而,经过仔细阅读,我才明白了杨博士比较孔子与保罗的深意。本书不但是一本比较神学之作,而且更是透过孔子的《论语》和保罗的《加拉太书》的比较,试图建立一套汉语神学之作。此一努力之所以甚有意义,因为《论语》是建立中华文化本色的奠基性文本之一,而保罗的《加拉太书》又是由景教徒最早传入中国的第一篇保罗书信,一如敦煌发现的叙利亚文献所示。杨克勤教授此书不再如林语堂那样简单的对称式的比较,而是在动态比较之中使儒学与基督教彼此交谈、相互丰富。杨教授将他所构想的汉语神学放置在当今世局全球化的脉络中来思考,

尤其关切世局的苦难与冲突。在我看来,今日世局的困境,来自性别、种族、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宗教信仰等种种差异各方的自我封闭,因而使得冲突愈发难解。杨教授本书应是出自他本人强烈的儒家之仁与基督徒的无私之爱,使得他在营构汉语神学之时,特别关心德行与暴力之对比、自由与枷锁之对比,并在这一充满差异与冲突的世界中,关心“吾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并希望生活于种种差异之中的芸芸众生都能和平共存。在我看来,此一问题意识的确有其永恒意义。本书巧妙地融合了概念分析、逻辑论证与叙事文体去论证其比较神学的洞见与汉语神学的视野。事实上,本书的确是近年来最精彩的汉语神学作品之一,以其对儒家与基督教的深湛理解,聚焦于孔子与保罗之间,引我们出入于比较神学的胜境。

就我本人的理解,保罗是一位孜孜不倦地在其宣教的旅途中迈向外邦人,以传播福音的伟大使徒。他那神奇皈依基督的经验,以及从大马士革到阿拉伯,到耶路撒冷再到安提阿,到叙利亚、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到北加拉太,到马其顿,到哥林多,……直到罗马……等等地方,为了传布福音,将基督信仰带给外邦人,不辞辛劳,不惧危难。对我而言,保罗的宣教旅程足足构成了我所谓外推历程与对多元他者的慷慨的典范。他为了多元他者的好处,走出了坚持于割礼的犹太律法,而无怨无悔地旅行各地。他邀请万邦来信仰一位完美地合天人于一身的基督,并以之做为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典范,而不再以接受割礼或其他犹太礼仪做为标准。他不断跨越边界,不只是走出地理的边界,也更跨越思想与信仰的界域。我想,《加拉太书》是由景教徒最早传入中国的保罗书信,这对华人所揭露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保罗对外邦人热心传布福音的精神,及其中所蕴含的对多元他者的原初慷慨与外推精神。

我用“外推”一词来指称这类走出自己而迈向多元他者,走

出自己熟悉的范围而走向陌生的领域,走向外人,走向陌生人的行动。我使用“多元他者”(multiple others 或 many others)一词来替换列维纳斯(E. Levinas)、德里达(J. Derrida)和德勒兹(G. Deleuze)等人使用的“他者”(the Other)一词,因为吾人皆是出生并成长于多元他者之间。“多元他者”要比“他者”更为具体,在本体论上也更为优先,而且没有“他者”概念难以释脱的与“自我”的二元对立关系。“多元他者”可以包容“他者”,可以包含“我与你”的关系,也可以包容“我与他们”的关系。

就历史而言,保罗生活于基督宗教向外邦人外推的历史动力的初始阶段。基督宗教从犹太地区向罗马、希腊地区,向小亚细亚,向欧洲、非洲、东亚与美洲扩张,最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这个过程可视为基督宗教不断外推,展示其慷慨的表现。这一动力过程可以说是基督宗教历史的本质,促使基督宗教不断进入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世界,成为其中的构成因素,然后推动他们各自以其方式走出自己,超越自己。

这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是一个卓越的外推与慷慨的宗教。就教义而言,上帝的创世行动可以视为出自上帝的慷慨,是由于上帝的原初慷慨,使他从无穷的大能与无尽富藏的创造力中,推出了万物,而宇宙中形形色色的存在物及其持续的演进过程,都可以理解为出自上帝此一原初慷慨与持续转化万物的行动。按照《创世记》一章,上帝对于他所有的创造物,都说是“善的”。由此可见,善的本体论是来自上帝慷慨创造的结果。并且,在创造宇宙之后,上帝仍居存于宇宙之中,以自然律则调节万物的运动与生命,并敦促他们自我走出,迈向更高的完善,乃至兴起更高形式的存在。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就更应学习上帝自我走出,以求更高的完美,纵然人的自由意志也可能选择封限于想象的主体性的自我封闭之中,而不关心自己与多元他者的关系,从而悲惨地闭锁于自私自利之中,这或许就是“原罪”的

意义所在。由于上帝的慷慨与爱,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取得肉身,甚至为了救赎全人类,为了全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谓“救赎”可以理解为从自我封闭的限定之中,重新对多元他者开放,横向及于他人与自然,纵向则与上帝修好。我以“基督宗教”一词代表如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信仰基督的宗教。各派基督宗教皆以耶稣基督为其信仰核心,而基督正是外推与慷慨的典范,敦促着全人类与全体万物也不断努力自我走出,不断自我超越,以至返回无限的美满之中。

对于今天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世人而言,对外邦人的慷慨与外推的努力可谓至为重要。基本上,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历程理解为一个跨越疆土或跨越边界的历程,直到涉入整个地球上的全体人类。保罗汲汲为外邦人传福音所树立的榜样,正是这种跨越边界,自我走出以迈向多元他者的精神。在今天,这对以儒家为本质的中华文化甚有启发,盖儒家至为侧重伦理的相互性,而非以原初慷慨对异己者不断外推。在我看来,基督宗教自十数百年前引进中国以来,已经带给儒家中国一个讯息,便是这种透过外推对多元他者慷慨的精神,至今愈显紧要,中国人应深加体会,好使得中华文化能在内在与超越、仁爱与正义、生命意义的建构与进一步的外推等种种张力之间,更为平衡地发展。

如果我们要在儒家的正面价值中找寻能有贡献于今天全球化历程的要素,应该可以在儒家立基于仁爱、中正、诚己、恕人以广推道德于人世的生活方式。迄今学界对于“仁”与“诚”的讨论甚多,本人在此便只谈谈恕德及其与仁德的关系。虽然《论语》中孔子关于“恕”所言者甚少,然其所说者皆十分重要,并以“恕”为终身可行之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论语》这一段话中,“恕”的意义是在消极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下理解的。再者,孔子也用同样的消极金律,来回答仲弓关于“仁”的意义的问题。既然“仁”与“恕”皆有同样的意义,可见两者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另一方面,孔子也用一积极金律来回答子贡关于仁的问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就儒家而言,自我与多元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诉诸金律来解决,无论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积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基础皆建立在相互性的原则上。在儒家的世界里,所有人的行为皆须接受礼的规范,即便是自我走出及其隐含的原初慷慨,皆须受到相互性原则的制约。为此,《礼记·曲礼上》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此外,孔子对于慷慨的理解也是讲究相互性的。子张问仁,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这五者皆基于相互性原则,其中,“宽”和“惠”涉及了慷慨之德。孔子说:“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在此,孔子在后果论的意义上看重“众”与“人”对于“宽”和“惠”的响应,正显示了相互性的原则。

当然,以相互性为基础的金律仍然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过,在我看来,在能够成立相互性之前,至少需先有一方的原初慷慨,自我走出,迈向他者,才能进而形成相互关系。也因此,原初慷慨与外推可谓一切相互性关系的必要条件。像法国社会学家毛斯(Marcel Mauss)在其《论赠予》一书中所论,认为相互性正是人类的社会性原理之所在,其实,在相互性成立之前,须有人慷慨先自我走出,走向多元他者,进而才能成立相互性。虽说在古典世界与近代世界,金律皆被视为伦理道德的重要原理,而相互性则为社会得以成立的原理,现在,值此后现代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在相互性之上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原理。在我

看来,此一新的社会原理应该是不断外推的原初慷慨。

实际上,对于多元他者无私的爱与原初的慷慨,正是基督教义的真正精神所在,这一精神不断敦促基督徒,甚至全体人类,要在讲究任何相互性之前,先行采取慷慨主动的行动。这是儒家过去所未曾强调的。《礼记·曲礼上》说的这段话综合了儒家的相互性精神:“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虽说此言突出了礼的价值与师道之尊,然而却遗忘了原初慷慨与外推的重要性。这点解释了,为何历代以来,儒学虽贵为中华文化之本,却未尝如基督宗教一般,主动努力向外邦人进行外推,不像基督宗教自圣保罗开始便不断外推,由加利利海边外推到罗马、希腊,直到整个世界。由此可见,儒家的相互性金律仍未为完整,需要佐之以外推与原初慷慨的动力,而后者正是由基督宗教所标榜,出自上帝创造世界、爱人类的启示。

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杨克勤教授在本书中将孔子与保罗合炉而冶,以建构一套汉语神学的努力。杨教授致力于使基督教义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并使儒家思想能为基督徒所理解,这份努力本身便是以交谈为相互的外推,表现了杨教授慷慨问学的果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孔子与保罗的思想和生命的阐述之中。这些故事赋予了神学论述以更为深切的具体感与亲切感。为此,我邀请各位读者细心品味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其中所展现的汉语神学思想,以及其中穿插交织、相映成趣的孔子与保罗的故事。

多伦多大学中华思想与文化讲座教授
兼东亚学系系主任
沈清松 序

自序

我生活在两个文明世界当中：一个是由儒家伦理所塑造的华人世界，另一个是由保罗神学所造就的基督教世界。虽然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是孔子与保罗都倡导和平与秩序。孔子相信，培养美德会产生和谐；保罗相信，以信心接受神通过基督给予的恩典会使人类在平等与公义中共存。可惜，这两种对和平与自由的信奉在历史上不断遭到恐怖和暴力的挑战。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体炸弹”盛行的时代，这些人如此绝望，以至于通过牺牲自己以夺走他人的生命来追求“荣誉”。但是如果“罪恶的轴心”采取恐怖的策略，那么“我们这些文明国家”就要采用武力并威胁先发制人，且坚信自己是正义一方而别人是魔鬼。如果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这相似之处便是两者都诉诸神的赐福，而且都准备以恶来反对对方——因此两败俱伤，使别人，也使自己失去人性。似乎更多的人寻求用武力解决冲突，用惧怕化解彼此间的怀疑及仇恨。

当前的局势使我回想起在两种古代经典中所描述的相似的惧怕和暴力。《论语》和《加拉太书》分别是儒家和基督教的经典，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两者都得到追随者的忠实研究。《论语》

汇集了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对当时的统治者和他的门徒们有关社会和政治伦理的教导与言谈。《论语》有二十章,大部分是孔子所说的话,也有他的主要门徒对他的教诲做出的阐释。《论语》倡导人性的仁爱,教导儒者培养美德并以之为活在这个充满着差异和暴力的世界中的生存之道。《论语》是一部神州大地的智慧文学汇编,而《加拉太书》为晚五百年后在地中海世界中出现的使徒书信。它是使徒保罗(公元前 6—公元 64)写给在加拉太的基督徒的一封信——在公元 1 世纪 50 年代初写成。保罗捍卫了他对基督福音的理解,即邀请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而不要求他们遵守犹太律法。保罗主张,为了形成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大团结的基督徒团契,^①人类必需把圣灵的力量和圣爱之道作为人类伦理的引导力量。虽然《论语》和《加拉太书》都是古代经典,但是它们所针对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再次出现。“论语问题”关注的是,通过暴力还是美德来建构共同体。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加拉太问题”关注的是,通过严守宗教仪式还是通过神恩中的自由成为神的子民。“加拉太问题”是犹太人或者说基督徒内部有关人与神关系的争论:这种关

① 本书的“外邦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等词汇明显是新约第一世纪的传统语言,但还不够准确。严格来说,当时没有“外邦人”这个群体(书中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也不是耶稣追随者的自称。笔者不仅使用这些传统语言,还认同 J. H. Elliott 的看法,参“Jesus the Israelite was Neither a ‘Jew’ nor a ‘Christian’: On Correcting Misleading Nomenclatur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5, 2(2007), 119—154. *Ioudaios* 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Ioudaios* 是非以色列人用来指那些有犹太血统,与律法及圣城和圣殿有关的,即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称耶稣的追随者为基督徒,而称他们为加利利人、拿撒勒人或道的群体。参 Steve Mason, “Jews, Judaeans, Judaizing, Judaism: Problems of Categorization in Ancient Histo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38(2007): 452—512; A. —J. Levine, *The Misunderstood Jew: The Church and the Scandal of the Jewish Jesus*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6), *passim*.

系是通过遵守律法建立的,还是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接受(或拒绝)建立的。

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种族多样化的世界中的华人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对《论语》和《加拉太书》的跨语境解读中,我的基本探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有关文化原因论,其次是有关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的混合身份。前者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华人成为华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孔子如何塑造了直到今天的中国”以及“保罗如何塑造了新教的西方世界。”后者追问的是:“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是否能够会通。”

本书导论和第七章包含了我用来安排本书其余六章内容的释经学取向。这两个骨架性的章节以叙事笔调,处理了中国文化以及基督教的道德和神学身份问题。^①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者,当我观察孔子与保罗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是如何作为文化批评者的,我也认同了他们的思想。

全书采用了跨文化的释经学,在经典的历史含义和文本实用含义之间游走。正如历史解读为我的释经设定了某种限制一样,读者们会发现,我的释经也使得我从某种特定视角解读古典文献。本书的解读主要偏重于“六经注我”的方法,但同时采用了“我注六经”的方法。导论部分讨论了当我在《论语》和《加拉太书》之间来回穿梭的时候所采用的跨语境方式。这两部经典在东西方世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读,但是却很少被放在一起阅读。我以跨文化的方式对这两部经典的解读可能是使两者进行对话的首次尝试。本书展现了孔子与保罗如何帮助我理解美

① 有关汉语神学的探讨,参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